



中國革命史話

1919—1949

第一卷 睡獅初醒

主編 夏以溶 副主編 趙迎生

夏以溶 吳少霖 夏 競著

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话

1919 - 1949

第一卷 睡狮初醒

主编 夏以溶 副主编 赵迎生

夏以溶 吴少霖 夏 箴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家领土的统一、主权的完整和经济的腾飞而奋斗！

学习近、现代史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让青少年认识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国家由旧中国发展到新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仅仅一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的伤亡就达到2100万人，财产损失数以千亿美元计。因此，谁也无权否定今天中国所走的道路，因为这是付出了如此沉重代价的人民百年奋斗、百年求索所作出的历史选择。

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如何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并值得探讨的课题。帮助青少年以史为鉴，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提高民族自豪感；用民族文化之精华培养青少年的优良品德，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应当成为历史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最为紧迫的任务。《中国革命史话》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中国革命史话》是西南民族学院、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学院、成都大学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十余名教育工作者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辛勤耕耘，采撷大量的史料，并融合他们的教学和研究成果编写成的长篇巨著，内容丰富，形式也较为生动活泼。我祝愿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书名题字：江泽民

中國革命史話

继承革命传统

开阔历史新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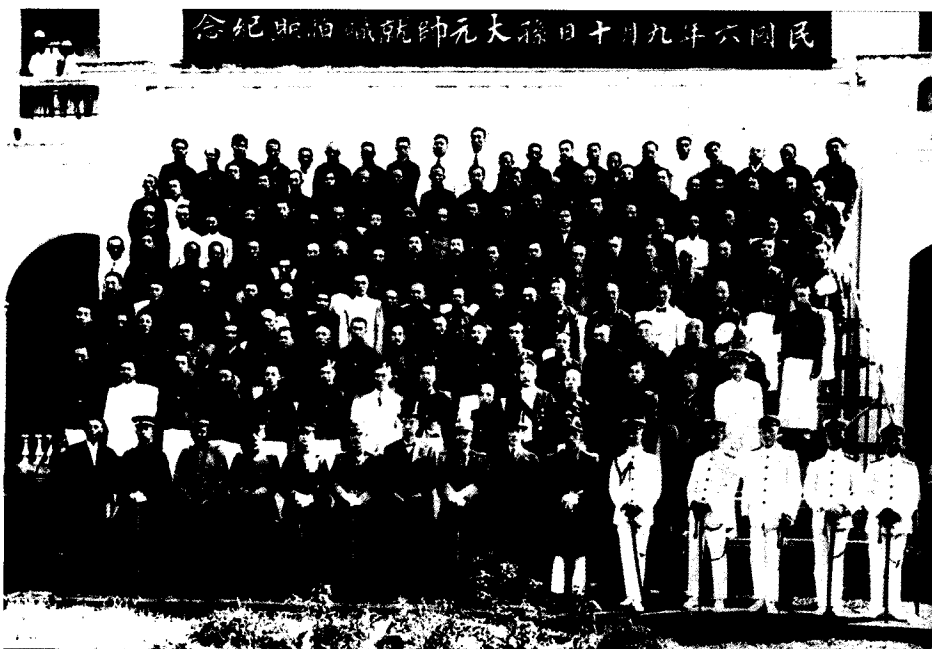
为中国革命史话卷

胡绳题





张勋复辟时街头挂的龙旗。



孙中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时与同仁合影。



1818 年，在中央公园群众演讲会上，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胜利》的演说。

图为 1919 年，李大钊（左二）和张申府（右一），梁漱溟（右二）、雷国能（左一）在中央公园的合影。



1918 年 4 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组织了新民学会。这是 1919 年 11 月 16 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的合影。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3000余学生齐集天安门前示威游行,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愤怒的学生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



1919年5月7日，在各界声援下，被捕学生获释。图为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返校后，受到热烈欢迎。



6月3日，上海工人罢工游行队伍。

为了振兴中华和造福人类（序一）

廖益隆

邓小平同志在 1987 年 2 月 18 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出，要用中国历史教育青年。在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发生以后，他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对青年、对人民的教育方面，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些重要指示的精神，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 1991 年 3 月，发出了关于在青少年和儿童中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的号召。

两年多来，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的上述指示和号召，针对大、中、小学生的不同特点，通过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和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情的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向青少年和人民群众进行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使广大的青少年和人民，热爱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 1/5 以上、有 5000 多年文明史的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只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剥削和近百年来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在近代以来才落后了。我们要使广大的青少年和人民了解，我们光荣的历史

责任就是振兴中华民族，并使我们的民族对全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要走什么道路来振兴中华民族呢？10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包括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的经验证明，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振兴中华民族，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此，在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孙中山也在这时提出“以俄为师”、同共产党合作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国共合作，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国民革命军在1925年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在1926年到1927年又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但就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蒋介石在他统治的22年间，把中国拖到了绝境。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又依靠美国援助，发动全国内战，企图把中国变为美国的附庸国。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奋起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走俄国人的路”不等于要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即在中心城市组织武装起义，一举而夺取全国政权。在土地革命时期企图照搬俄国革命模式碰了壁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所代表的这条正确路线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0年以后的1945年，中共七大又确定以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

领导下，于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随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头7年内，即到1956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取得了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使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光辉胜利。

但在随后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中，在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长期的艰辛探索中，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所说，在党内，出现了两种趋向的对立。一种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中共八大提出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基本上正确的路线，以及在八大以后在坚持八大路线的前提下继续向前发展的趋向。另一个趋向是坚持照搬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旧模式（建国后初期，在中共八大以前，中国已照搬了一段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坚持照搬前苏联的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领导制度、战时统制型的指令计划经济体制，再加上毛泽东同志自己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而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倾向。1957年下半年以前，毛泽东同志是站在正确趋向方面的。八大路线是在他领导下制定的。八大以后，他又发表了坚持并发展八大路线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但在这以后，即他在反右斗争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以后，他就转到“左”的错误趋向方面，并使这种趋向在党内占了上风（包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徘徊）长达20年之久。这种长时间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给党、国家、人民和毛泽东同志本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9月5日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从1921年建党到1957年，36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他还说：“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40多年间的伟大历史转变，它标志着以邓小平同志为集中代表的、党的历史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开始形成，并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得到系统总结而达到成熟。十四大报告说得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这个问题，前人是还没有解决的。这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走出了一条新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

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严重妨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的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旧模式在 1989 年的东欧剧变和 1991 年的苏联解体中，已经宣告失败。

邓小平同志在 1987 年 10 月 13 日的谈话中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他在同年 11 月 16 日的谈话中又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于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五六十年的时间，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要用上百年的时间。”

邓小平同志在 1991 年 8 月 20 日的谈话中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确实，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集中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实行改革开放来加快发展生产力的速度。这样两个问题过去长时期内是没有完全搞清楚的。结果使社会主义事业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邓小平在 1992 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斩钉截铁地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所证明了的一条最重要的真理。

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在1990年4月7日同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的谈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但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而且是为了对全世界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8月21日的谈话中就说过：“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他在1987年4月26日的谈话中又说：“总的来说，我们确定的目标不高。从1981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20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到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

4000 美元。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 4000 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 4000 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 15 亿人口，人均达到 4000 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 6 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中国革命史话》是以西南民族学院、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学院、成都大学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为主的十余名忠于教育事业的史学工作者，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工作，采撷丰富的史料并融合他们教学和研究成果而编写成的一部长篇巨著。这部书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生动叙述，来展现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即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总计 30 年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部书史料翔实、观点正确、记叙生动、可读性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话本式的好史书。

爱国主义是一面旗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振兴中华民族的强大动力。邓小平早在 1980 年就指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党的十四大报告也强调，要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因此，各级各类学校要深刻认识对广大青少年坚持不